

新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态势及对策^{*}

刘须宽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的立场是确立社会发展方向、国家制度性质与民族精神价值的坐标。意识形态的是非观决定着我們能不能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只有切实认清意识形态认知中的非科学论、终结论、趋同论、价值伪装论、技术侵蚀论等误区，以及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整体态势、形式变化和工作对象的新特征，才能精准施策、守住底线。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保持政治定力是关键，必须构建起意识形态建设的大格局谱系；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努力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正向转换；顺应视图时代要求，不断革新思想传播手段；抓好两个“关键少数”；营造马克思主义群体积极发声、亮剑的舆论态势，方能筑牢防线、前推阵线。

【关键词】新时代 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刘须宽（197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意识形态”是思想史上最容易陷入混乱、歧义最多的概念之一，它是集文明化、阶级化、制度化、政治化、物化、神化，乃至丑化、妖魔化于一身的概念。作为“维持、改造或摧毁”某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②的意识形态，在护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意义重大。随着网络化、大数据、云技术与智能化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与长期性日益凸显，倒逼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不断开创新局面，把握主动权、形成主动态势；必须理性规避认知误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意识形态认知的几个误区

新时代不是“去中心”“去阶级”走向“普世价值”的时代，我们需要谨防经过学术包装美化的理论借用新时代概念否定意识形态的政治、阶级等本质属性，理性甄别与规避潜藏在讲坛、学术话语中的种种认知误区。

第一，意识形态非科学性的认知误区。讨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这本身就误入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歧途。以科学的方法把意识形态确立在真理和道义的价值上，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对旧制度中的个人欲求与国家欲求的差距、西方意识形态主张的内容而言的，并不是否定意识形态本身。然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反过来又成为西方理论界拿来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攻击的武器。敌对势力常常用马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前途命运暨当代国际形势研究”（18@ZH01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研究”（2017YCXZD003）的阶段性成果。

^②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9页。

克思的如下主张来反驳马克思：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西方学者以马克思这一主张为由，把意识形态视为主观剪裁的结果，正如柯林伍德所理解的，意识形态主张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自我授权”^②的，历史也只是史学家理解现在的主观尝试，都没有客观科学依据。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③阿尔都塞表面上是在“保卫马克思”，实质是背叛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职能和社会发展理论，本身就是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也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何来表象体系和理论认知体系的区别？意识形态既是作为存在者的社会认知的结果，也是理论选择的结果，不是少数人的意志，更不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虚构的非我的“神话”。从“神话”立场上理解意识形态，暗示着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要认知真实的社会与真实的自己，就必须打破意识形态“神话”，走向科学。

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依赖于意识形态，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任何主张意识形态“非科学”“去中心”“无立场”的主张，都注定是贩卖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隐蔽骗局。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判断。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必然是以“观念的上层建筑”为价值内核，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价值判断，并使其体现在主流文化之中，其科学性来自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和立于道义至高点之上对人类自由求索的理性判断中。

第二，意识形态是无规律的价值伪装。在怀疑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上，卡尔·曼海姆与卡尔·波普尔一样，前者企图否定意识形态的规律性，后者试图证伪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卡尔·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时，抽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一底色，他把特殊意识形态理解为甲方对于敌对的乙方的观点的怀疑，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④。至于这种怀疑有没有根据，是不是依从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更替的必然性，卡尔·曼海姆则采取了回避态度。卡尔·波普尔则认为，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历史假说“只是关于某个个别事件或一些这样的事件的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才可能算出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⑤。也就是说，不能依据昨天具有某种发展“趋势”的事物，得出该事物的未来发展必然具有“规律性”的结论。他甚至主张，即便马克思关于历史预言是成功的，也只是局部的成功，而这个“局部的成功”，“并不是他的历史主义的方法”^⑥的胜利。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唯物史观的方法的成功，而是“制度分析方法”的成功。这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除此之外，汤普森也主张，“社会制度的某种必然性”是基于社会想象导致“社会对于它自身社会—历史存在的误认”。“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不应该“由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确保，掌控“符号资本”和“语言资本”^⑦的统治阶级会借助于意识形态形成某种“语言暴力”，以“语言力量”遮蔽“理性力量”。汉娜·阿伦特更是把意识形态视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②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68-269页。

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9页。

④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6页。

⑤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91页。

⑥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郑一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⑦ [英]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63、69页。

“极权暴力”，她说：“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① 这些西方学者，基本上都是站在唯心史观立场上，无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以碎片化方式解读历史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意义。

第三，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认知误区。西方学者主张意识形态终结有“最动听”的借口：因为“邪恶”，所以要终结。把意识形态看作是邪恶力量的主张，在西方一直很有市场。比如，布热津斯基这样评价：“我们发现19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乐于运用暴力推行既定的改革，正如我们这个时期卢森堡夫妇或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容异己与无情。”^② 贝尔更是露骨地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学家是有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人们只要求诸意识形态的自动取货机，就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旦这些信念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他理解的意识形态是“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玩弄的“修辞学”，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③，因为这个“修辞学”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诡辩术，贝尔希望像终结诡辩术那样终结“意识形态”。福山甚至主张：“共产主义对自由构成的威胁是如此直接和明确，其学说如今这样的不得人心，以至于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被完全赶出发达世界。”^④ 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主张“最优化”的终极表达，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外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否定，也是对非资本主义的所有政治主张和政治价值的否定。

第四，两种意识形态趋同的认知误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对西式民主的美化表达促使其他国家接受，以此平息意识形态纷争，试图借助西方“普世价值”的宣扬来实现不同意识形态在价值上的同化。意识形态纷争向民主化认同的转移，其实质是要通过“普世价值”不断遮蔽、抽离意识形态的制度属性。西方意识形态把自己伪装在普世的民主政治、自由价值、人权主张、正义平等的诉求之中，以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终极模式自居，不断挑起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颜色革命”，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它们试图借助于超越阶级的人学的“普世价值”化，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西方文化理念的输出，以达到实现趋同后的意识形态同化目标。

美国学者泽鲍特讲：“完全可以有根据地预料，世界上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趋同现象，是朝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前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极端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⑤ 个人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的东方意识形态是具有本质性区别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性，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外化为可以通约的社会价值与人类共识，其阶级主张都是不可通约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许在维护社会稳定、团结群众、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上具有短暂的一致性，但它们最终必然呈现为截然不同的阶级立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的趋同论是极其危险的价值误导。这个价值误导的基本立论，不是西方向东方趋同，而是东方的意识形态向西方趋同；不是东方与西方意识形态融合的过程，而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的过程。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还是各种意识形态向西方“普世价值”趋同而走向终结的荒谬主张。党性与集体主义一旦让位于个人主义，则注

①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586页。

② 转引自[美] 凯瑟琳·奈特：《20世纪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型》，张英魁、陈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

③ [美]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5、466、467页。

④ [美]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⑤ 转引自王霁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败。

第五，技术对意识形态的侵蚀消解的认知误区。哈贝马斯认为，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正在被科学技术弱化。“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① 技术以其隐蔽的意识形态价值，统治着意识形态的神经中枢，不断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可惜的是，哈贝马斯不能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揭示技术统治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迷惑性与欺骗性，而是从科技成果的质感体验这一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无端指责以往意识形态的“迷惑性”与“虚假利益”，赞同技术优势强化资本主义统治合法性的主张。其实，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异化”体现。人们对于技术的膜拜，往往容易遮蔽意识形态的诉求。“大众社会和崇尚技术的文化的增长，加重了人们的冷漠情绪。”^② 这种冷漠往往是对于技术过分热情而造成的政治冷淡与意识形态漠视。正如哈贝马斯所阐释的那样，技术工具把意识形态包裹起来，人们陶醉于技术的变革和获得物质利益与服务的便捷，而更容易被蒙蔽或麻醉。资产阶级借用技术的变革，不断消磨工人阶级变革的意志，资本家通过文化的、市场的、技术的方法，巧妙地诱导遮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诉求。

我们必须谨防技术制约人们关于世界、社会发展和人生理想的理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价值观念、理想信念和社会选择意向不能被技术的某些光环遮蔽。在网络化、视频化、直播化的读图时代，深邃的意识形态问题往往容易被娱乐化的快餐文化遮蔽。李普塞特援引共产党批评家莫斯科维乔夫的观点指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在日渐枯萎”^③，技术变革在其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反过来，用好技术优势又能生成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所阐述的“三个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仅仅谈到技术与人才，也有技术背后的考量，即通过科技发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二、认清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本质与新变化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黏合剂”^④，“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⑤。“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越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⑥ 党中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⑦，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精准把握，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出发点。只有弄清是什么，才能知道怎么办。

第一，认清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本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了中国“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走的信念，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始终做坚持中国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② [美] 杰拉尔德·古特克：《哲学与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教育》，陈小端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③ [美]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1页。

④ [英] 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⑤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⑥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3页。

道路的柱石”^①，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张。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要像邓小平在苏联求学期间所主张的，“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②。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必须亮明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包括三种形式，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在思想理论领域中的集中反映。那些试图遮蔽阶级身份、超越国家与“去价值”立场等主张，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隐晦表达。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容误判。任何舆论报道都是有阶级立场的，任何新闻报道也都是有意识形态立场的，超越阶级意识、立场、价值的宣传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明白，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现实性，只有凸显进步阶级的鲜明主体性，坚定进步阶级的立场和价值追求，才不会为各种思想纷扰所左右。看不清意识形态悬崖，就可能掉入执政悬崖，走入思想混乱迷茫的牢笼。

第二，认清当前思想斗争的整体态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整体向好的主动态势，但整体向好不等于全面变好，主动态势不等于绝对优势，网络清朗不等于没有杂音。事实上，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夯实价值认同基础依旧任重道远。在争夺人心的战斗中，我们必须着力增强政治生活与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近年来，西方经济呈现低迷态势，欧美国家发展困境难脱，中国风景独好的局面正在深刻影响国际与国内公众思想认识。中西发展的强烈对比，也加深了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这无疑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窗口期。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历史虚无主义的声音减弱了，但并不等于销声匿迹。这些错误思潮经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的重要节点及敏感时期粉墨登场，比如，热炒市场经济原则与社会主义理念相矛盾；主张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仍然是为了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鲜有创新；改革开放实践早已弱化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把改革开放前后的马克思主义标签化、对立化；夸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深层次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渲染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放开市场经济是一对矛盾体；宣扬让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和平”共处；妄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仅仅是意识形态建设。凡此种种杂音，背后都隐藏着西方的政治价值、虚化阶级观点、倡导多党制、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宪政民主、宣扬完全市场化、鼓吹党从国企完全退出等谬论。对这些错误思想，如果没有清晰的判断，必定会误导民众、影响党的思想统一和国家发展定力。

第三，认清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变化。当前，颠覆我国意识形态的手段更加隐蔽、变异和“学理化”，主要体现为：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武器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意识形态；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与人民性对立起来，借局部问题制造裂缝；以技术幻觉掩盖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的真实存在；通过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移花接木，迂回进攻，向中国输出西方的意识形态。资本为获得自由榨取的权益，正在借助经济问题发难，西方“普世价值”藏身于资本之中，正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认知世界。利用中国改革政策唱衰中国的有之，如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 2025 计划救不了中国，中国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房价这根稻草一定会压垮中国等；散布中国威胁论的有之，如借南海仲裁闹剧、美国向亚太战略再平衡、韩国萨德导弹部署，热炒中国威胁论等；主张悬崖论的有之，如带着“价值观输出”而来的资本正在操控媒体舆论，散布北京正站在悬崖边上的言论。少数精英人物正在成为风向标，尽管不直接染指意识形态领域，但他们的话语却能对思想统一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变异手段导致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复杂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② 《邓小平手迹选》，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

多变。

第四,认清视频读图时代的“新一代”。“90后”“00后”是充满可塑和变数的网络“新一代”,他们生活在各种复杂的“网格”中,每天接受着网络的价值观、使用着网络的语言、传播着网络的意识流,而后者也在塑造着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进而内化为他们实际的人生观。意识形态必须抓住这个关键的生力军。大量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主张在主流媒体的正面打击下,必然要流入更具有隐蔽性的网络空间,各种境外势力也会借助于互联网优势技术,实现超越时空的远程传播。面对云端大融合、大数据、智能化大变革趋势,8亿多网民的超大规模用户人群,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融合必然会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较量主战场。打赢意识形态斗争需要加强互联网技术、体系和理念的创新,与多样态、全镜像的思想文化传播方式对接,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向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渗透,推动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模式升级变革。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应对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①面对传统的和变异的种种错误思潮,必须筑牢意识形态斗争的防线。

第一,必须全景式地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构建起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新要求,构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立体化图谱,做好思想的矫正实践。新时代本质上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不断接近、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进程,除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承载着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重任。当前,尽管我们依然处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处于弱势地位的时代大背景下,但要看到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打破资本主义企图一统天下的格局、打破“历史终结”的神话。这是社会主义重登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窗口期,重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要机遇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从短期看,中美贸易较量是利益之争;从长期看,中美贸易之争则是制度之战,作为社会主义代表的中国的崛起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道路的巨大挑战。西方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公然宣称要抵制社会主义,从政治上羁绊中国;用限制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等手段,从经济上封锁中国;以“普世价值”、宣扬“美国梦”的影视作品和西方学术话语等,从思想上渗透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破产了”“失灵了”“过时了”的论调,从思想上搞乱中国;以贸易战和隐形西方联盟,在发展上牵制中国;擅长“离岸制衡”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挑唆外围国家,以地缘上C型包围与军事布局来孤立中国;以“美国重建中国”“再造中国”的自大狂妄,讹诈中国;以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论、“霸权论”“新帝国主义论”和“修正主义”,在形象上丑化中国;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甚至不惜用“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的论调威胁中国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从战略全局上、长远上、根本上看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迫切性,必须在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诸多深刻论述中把握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构建起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大格局谱系。

^①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第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始终站在真理和道义的至高点上，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指导上必须保持理论的彻底性。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经得起审视和讨论。意识形态工作理论的彻底性来自：（1）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意识形态理论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形态更替规律作支撑。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公无私、最具有广泛性和人民性的概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维护少数人统治的狭隘性不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立足于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是未来人类价值的必然诉求和价值预备。判断意识形态不能仅仅用逻辑学的真伪来把握，也不能与冰冷的定律规律相比较。意识形态始终做的是团结人的工作，把人心聚拢起来，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并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才是意识形态科学与否的判断标准。（2）“两个必然”的论断支撑。“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彻底性的重要价值依托。尽管当前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不足，资本主义自身也有所改良，但蕴涵在其肌体内的基本矛盾和化解根源性危机的方法，永远无法从这种制度内部找到，只有推翻这种制度体制，才能解放被私人占有制束缚的生产力。（3）“四个意识”与“四个自信”的政治定力。依托“四个自信”审视西方用“非科学”消解意识形态价值的险恶用心，站在“四个意识”立场上看清西方借用民主、人权进行颜色革命的本质。认清西方自由民主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雅克·德里达所批判的“一种失败的掩盖”。他指出，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①。（4）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民的意识形态，人民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主体，而不是阿尔都塞所理解的“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②。只有基于人民立场选择的意识形态价值，才是朝着历史发展必然性进发的意识形态主张。它绝不是卡利尼科斯所理解的人民主体地位的“幻想”，“意识形态是男男女女被塑造成参与一个他们自己不是创造者的过程，意识形态通过赋予他们以幻想履行了这一功能，让他们相信历史是他们创造的”^③。人民不是无知的“他者”，也不是乌合之众的聚合，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这是一切社会科学立论的基础。

第三，积极应对视觉化、情景化、图式化的传媒发展势头，努力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正向转换。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评论员的网络化、图式化、视频化时代，互联网确实是我们思想工作面临的“最大变量”。实践证明，传播载体越多，思想越是活跃，越要旗帜鲜明地抓好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④。以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电视台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与都市报、小报微刊、自媒体、网络构成的民间非官方舆论场并存，当前两个舆论场正在发生相互融合与正向转换，势头可喜。我们要力争在更宽领域、更大孔径地打通两个舆论场，实现两个舆论场的情绪共振。两个舆论场的最终统一程度如何、叠加的内容多寡决定着主流的舆论导向、影响力和战斗力。两个场域重叠越多，越是表明舆论引导的针对性高、有效性强、民意统一性好、国家意识形态局面好、舆论统战力强，应对各种意识形态纷扰能保持强劲的锋芒与对抗力。如何确保两个舆论场的交集越来越多，不断巩固意识形态斗争总体向好的趋势，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①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02页。

③ 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1976, p. 70.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记关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重大主张落细、落小、落实，这是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南、根本遵循和强大武器。二要加强全国思想文化、新闻战线、影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系统、高校、党校等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坚守住第一舆论场的阵地和防线。三要强力发声，纠正错误思潮和行为。谨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颓废意识、悲观厌世的情绪在全社会的蔓延。如主张只有寻求“普世价值”的“救国良方”，中国才有希望；诋毁中国政治改革的成绩，用极个别错案或事件放大中国法治污点；煽动90后的丧气情绪，为不奋斗找到看似合理的借口；不管是“蓝瘦”（难受）、“香菇”（想哭）爆红网络，还是“葛优瘫”“碧瑶坐”的流行，都间接地体现出一种消极社会生存心态、慵懒意识的抬头。不纠正这些思想意识，两个舆论场就不能正向转化。

第四，必须用创新手段应对泛在化的网络，革新思想传播方式，做好融媒体建设，努力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网络的普及使得意识形态工作更加泛在化。一方面，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积极姿态，抵制网络对于人性邪恶面的释放，杜绝颓废文化、低俗文化、丧文化，谨防网络“腐蚀和破坏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价值观”^①。另一方面，净屏治网要多管齐下。信息泛在与翻墙软件的不断翻新，加大了监管的难度，但越是难度大越是要努力做好这项工作。中央之所以强调要让意识形态工作如空气一般，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原因就在于对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网络不仅仅造成需要监管的内容的泛在化，也促成传播手段的多元化。跨国界、跨语种的敌对意识形态内容的泛在化，面源扩张使得精准打击难度加大，必须研究和应对浏览这些泛在化信息的人群。

意识形态斗争既要旗帜鲜明，又要讲究手段艺术，形式活泼多样。舆论斗争要用最合适的方式，以积极的姿态净化网络这一新政治舆论场域，当“90后”成为国家建设主力军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是网络最活跃的主力军。“90后”的新特点决定了舆论场域、话语结构、表达方式的不同，要善于用“90后”能够接受的流行方式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斗争的主体性和原创性融入青年阅读载体和视听媒介，实现融媒体发展，是新时期意识形态斗争需要破解的新难题。需研究利用“马克思靠谱”等大众化传播方式走近当代大学生、夯实“90后”认同的共同思想基础和价值基础，利用年轻人喜欢的微直播、秒拍、抖音、朋友圈等传播载体引导青少年，是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警醒我们，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年轻网民的意识形态安全，必然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安全。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共享等特点，把握和运用好大数据，提高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配置效率，掌握好网络舆论宣传的时、度、效，营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清朗网络生态。

第五，抓好两个“关键少数”的“小众化”人群。一是要抓关键岗位的关键领导干部这个“少数”，另一个是要抓好对青年人影响较大的群体，特别是公众人物、影视名人、企业家等小众化群体。这两个“关键少数”都具有意识形态引领作用。新近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对关键岗位领导干部的监督，重点监督其政治立场、加强党的建设与否，以及执行党的决议、选人用人、责任担当、廉洁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情况。谨防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信仰和信念缺失，在大是大非面前游移不定、左顾右盼、随意逢迎，甚至与中央唱反调。如果一些处在关键岗位上的“少数”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研判形势，就极易走上西化的歧途，这与党的执政理念背道而驰。作为另外一个“关键少数”，企业家、律师、影视明星、作家、高知群体等精英，

^① [美] 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第159页。

他们依托身份的特殊影响力，更容易引导公众，左右公共话题，设置公共议题。谨防精英人群动用资本的力量牵引、控制媒体，影响媒体的音量、音效、音质，甚至绑架舆论，直接攻击党和政府。避免出现有些人担忧的：资本让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资本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的情况。资本控制舆论的力量越强，对主流意识形态威胁就越大。如果这类人群被更大的资本捆绑，则更易于利用资本制造话题，如热衷于追求奢华炫耀，以偷税漏税为荣，以移民为傲，甚至主动迎合资本，生活方式西化，恶意操纵金融等，必然导致舆论调控和导向管理难度加大。所以用正确思想统领少数意见领袖、联盟少数精英、管好影视名人，也是做好新时期舆论工作的重要抓手。

第六，马克思主义群体要积极发声亮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必须斗争，不能搞无原则的“爱惜羽毛”那一套，不能对大是大非绕道走。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现状要扭转，在一些领域意识形态的“失语、失踪、失声”境况要改变。西方封锁中国从不“失语”，如果我们失语，风险何其巨大。一些党员干部和主流媒体常常“失声”，甚至鸦雀无声，而敌对势力不会“失声”，总在不停地叫嚣、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意识形态在教材中“失踪”的结果，使得教授、学生纷纷穿上西式学术的外套。当前思想领域一直不缺少斗争，只是斗争的形式会随着政治生态和思潮变异而不断变换台词和风格。社会思潮正在以多棱镜的形式展示着当前社会思想形态的不同镜像：历史虚无主义想再掀波澜，污蔑长征精神、丑化英雄、抹黑红军形象，肆意散布“逃跑主义”言论；“普世价值”从未走远，大肆宣扬西方的民主精要、宪政良方、自由博爱等价值，主张世界只有向西看才有未来；极力唱衰中国的声音不断，说中国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中产阶级正在崩溃；不断挑起意识形态话题，说中国没有市场，只有集权与计划，“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宣扬奋斗无意义，什么也改变不了的颓废的“丧文化”，如烧炭自杀、人生纠结无味，“卡奴、车奴、房奴”等“奴文化”，“夜淘族”“恐婚族”“蚁族居”等“族文化”，宣扬“压力山大”“意志颓废”，破罐子破摔的宿命论抬头，“视听麻醉”“伤感音乐”“流浪情绪”增多，等等。

面对纷繁复杂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群体挺在前面、站在风口，理性回应各种非难和歪理邪说。对当前的多种动向和错误思潮，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析评判，务必撕下各种错误思潮的温情面纱，揭露其本质。这些错误思潮无非是把矛盾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与文化基础。目的在于移花接木、拆分嫁接、混淆视听、迷惑思想、制造情绪、丑化中国、搞乱中国、阻碍中国崛起、遏制中国发展。面对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理性客观地斗争、条分缕析地批驳，才能最终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 [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4] 赵永清：《用科学思维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
- [5]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编辑：刘影）